

WENYILUNCONG
WENYILUNCONG

文艺论丛



I206
7
19

文艺论丛

· 19 ·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文艺论丛

(第十九辑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25 字数 351,000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00 册

书号: 10078·3443 定价: 1.55 元

目 录

《〈文心雕龙〉义疏》体例·····	吴林伯 (1)
中国题画文学的发展·····	曹铁珊 罗义俊 (25)
曹丕诗文及其理论探索·····	柴青岳 (44)
苏轼论艺术风格·····	陶文鹏 (59)
晴雯——一个沦为女奴的贵族小姐·····	周光熙 (81)
诗情画意——《红楼梦》语言艺术特色之一·····	周中明 (106)
《红楼梦》回目欣赏·····	陈 诏 (127)
试论《聊斋志异》的社会意义·····	李 樾 (132)
——兼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	
龚自珍的文学思想·····	杨昌江 (154)
南社诗歌的艺术特色·····	马 进 (167)
演义小说家蔡东藩的启示·····	金 名 (189)
托尼学说, 魏晋文章·····	时 萌 (203)
——鲁迅思想研究之一	
阿Q的典型性格问题·····	徐子余 (232)
论子君·····	吴宗蕙 (264)
《蔡文姬》的主题和人物·····	高国平 (284)
两个勇敢的跋涉者·····	张毓茂 (309)
——论萧军与萧红	

《雷雨》结构的成就和不足·····	马中行	(326)
贺敬之诗歌的抒情艺术·····	吴欢章	(345)
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异化和人性恶·····	吴立昌	(373)
高尔基创作中的人道主义·····	符玲美	(404)
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(选译)		
····· [俄] 亚·伊·赫尔岑著	程代熙译	(427)
我的沙龙 (选译)····· [法] 爱弥尔·左拉著	许庆道译	(447)
伍尔夫传····· [法] 安德烈·莫洛亚著	薛立华 刘秉文译	(461)

《〈文心雕龙〉义疏》体例

吴 林 伯

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(以下简称《文心》)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、自成系统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。从李唐长孙无忌等撰《隋书·经籍志》起,历代史志都有关于它的著录。李唐赵宋以后,文人、学者的书札、诗话、杂论、书后等作品里,大都提到它,但多属片言碎语的赞颂,缺乏全面、深入的研究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辛氏《文心注》,明代梅子庚疏证过《文心》的部分篇章,清朝黄叔琳的门客,也作了《文心注》。但是这些东西,属于字词、典故的考索。可喜的是近人黄侃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间,在北京大学讲授《文心》时所写的《札记》,开始着重理论的探讨。稍后,范文澜的注,近似李唐李善的《文选注》,以参验典故为主,很少理论的剖判。此外,刘永济的《校释》,杨明照的《校注拾遗》,对字、义,也有所阐发和校刊。总之,以上的著述,在《文心》的研究上,曾发生不同的作用。唯独“四人帮”大搞民族虚无主义,公然以“儒法斗争”的反动模式,彻底否定《文心》。直到现在,文学评论工作者才把《文心》的研究,摆到应有的地位。早在一九三二年,我便诵习《文心》,感到它的语言艰深,特别是牵涉的范围广泛,的确难于领会。一九四八年秋,我着手《文心义疏》的写作。

众所周知，古籍的注释，渊源甚古，先秦已有了。象旧说春秋孔子的《周易传》、左丘明的《春秋传》、战国韩非的《解老》……都是早期的注释。再到刘汉，注释日益兴起。当时，所谓“经学”，主要是注释，而且逐渐推广到各个学术领域，读者把它当做钻研古籍的工具，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终身的专业。经典性的古籍，注释竟达千百种之多。而注释的名称也不一律。比如两汉经籍的注释，或者叫“传”，或者叫“笺”，或者叫“解故”，或者叫“章句”……六朝人又叫“义疏”。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春秋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……都有《义疏》。

无庸讳言，由于历史的、阶级的局限，古人注释的缺点是很多的，就其主要的说，首先是杂糅，不少注释家强调“汇通”，异家别说，往往混为一团。例如西汉刘向既以阴阳、五行附会《尚书》的《洪范》，后汉经生，又以讖纬穿凿群经。至于曹魏王弼的解《周易》，萧梁皇侃的疏《论语》，还都渗透老、庄。如此杂糅下去，势必丧失原著文义，降低注释的科学性。

其次是外加。这和杂糅相似，而不同于杂糅的，乃是注释者将某种毫不相干的东西外加到注释中去，存在另一种意图，即封建统治者要求注释给他们说教。两汉以《经》取士，热中利禄的经生说《经》，也就歪曲原意，无中生有，借以迎合君心。正如清陈澧所说，东汉郑康成以礼解《诗》（《东塾读书记》）。《诗经》描写劳动人民爱情，反抗统治阶级残酷剥削、压迫的诗歌，被披上“礼教”的外衣，有时，局于说礼，甚至改变字句。又如东汉的章帝，降意儒术，特好《左氏传》，建初元年，使贾逵发明《左氏传》的“大义”，逵竟明称《左氏传》里有言刘汉为帝尧后裔的，这样外加、阿谀，从而要取世资。这些注释家不惜“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”（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掩盖经典的真实面貌，“人用己私”（东汉许慎《说文叙》），麻痺读者。

又其次是烦琐。两汉经学，约分今、古文两派，今文经学重大毛病是烦琐。我们不由的联想起汉代的注释家，因为他们一则生在秦皇焚书、楚汉连年战争之后，书简残脱，众说纷纭的时期；二则“不思多闻缺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于是今文经学家醉心烦琐考证，蔚成风尚。本来三言两语，即可结束，而却旁征博引，不惮辞费。刘勰治古文经学，断然指出今文经学家“若秦延君之注《尧典》十余万字，朱普之解《尚书》三十万言”，使“通人恶烦”。相反的，古文经学家“若毛公之训《诗》，安国之传《书》”……都“要约明畅”（本书《论说》），可为典范。

又其次是保守。在师、弟学术的传授方面，孔子比战国荀卿高明。孔子教学生不要以为先生年长，发言有所顾虑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，当“各言尔志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。而荀卿尊儒、传经，弟子必因循师说，做到“师云而云”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。要是“言而不称师谓之畔（同叛），教而不称师谓之倍”（《说文》：“倍，反也”）。在经典的解说中如果违反老师，便是“倍畔之人”，“明君”不任用，“朝士大夫”即使在路上遇见，也不得同他讲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。很清楚，汉代经生对于师传，效法荀卿，先有“师法”，而后“师法”之下，再分家数。仿佛树木的干又分枝，古今文学派的对立，有若水火、冰炭，注释家“各有所执，乖戾分争”，株守一隅，互不相通，象郑玄那样地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实事求是，不拘门户的，鲜不多见（刘宋范晔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）。终于发展到盲从攻击，“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。”（西汉刘歆《书让太常博士》）因此，“或怀嫉妒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”（同上），甘心把自己幽囚在“师法”“家法”的樊笼里而不能觉醒，思想一天天地锢蔽，僵化，一味因循，以致“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。”（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）严重阻碍学术的发展。

我这样说，并不是否认旧的注释内尚有若干值得借鉴的地

方。原来以往的少数注释，如西晋郭象的《庄子注》，曹魏王弼的《周易注》，赵宋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程颐的《周易传》都不停留文字、器物、形象的诠释，而侧重义理的引伸、发挥。尤其是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上承《左氏传》，既有江流的记述，又有山陵、史迹、谣俗的描绘，结合文献，注意辨正，造语清新，结构谨严，使注释学术化、散文化，卓然自成风格，开启注释的新纪元。

不仅如此，古代有些注释家，态度慎重，倘用西汉扬雄的话说，他们只“审其是而已矣”（《法言·学行》），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（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），唯是是求，决不标新立异，掉以轻心。李善注《文选》，“旧注是者因而留之，其有乖谬者”，他“乃具释”（《西京赋注》）。同时，再三修订，不自满假。试看李匡义《资暇录》，便知他有初注、复注，以至三注。赵宋苏子由注《老子》，也自言“晚年于旧注多所改定”。程颐《周易传》脱稿，门人请授，他表示“更俟学有所进”。朱熹集注《四书》，字字称量，深思熟虑，如老吏断狱，一丝不苟，他们注释质量较高，是与态度的慎重分不开的。

因此，我注释《文心》，批判地继承旧注，并反复调查，根据读者的要求，以及个人的想法，制订《义疏》的体例，就是每篇原文，分段排列，而每段后面的《义疏》内容，不外字词的解说、大意的概括、文句的串讲、思想理论的分析、评议。而且，我在写作《义疏》的全过程中，注意了以下诸方面：

一、从广大读者现有水平出发。目前，中、青年阅读古籍的能力，一般不高，迫切要求出版适合他们程度的注释。换句话说，注释要通俗些。这里，我们应该指出：通俗与否，是以读者的水平为标准的。同一注释，随读者水平的高低，而有通俗或生奥的区别。譬如东晋陶潜的诗里，常用《论语》内的词意，在古直《陶诗笺》以前，很少注出。这不是注者不懂，而是没有注的必

要。因为那时《陶诗注》的读者，读过《论语》，而《论语》是童而习之的书，在他们看来，不注仍不失为通俗。可是现在的中、青年读了，就可能有人认为不通俗了。《文心义疏》针对这种情况，介绍作者，都用语体，不是史传的摘录，典故也用白话简述它的来历和在本篇所表达的意思。万一征引原文，便先加注释、今译，然后释义，不使注成为古文的积累，使注还要注。与此同时，《义疏》留心文化知识。本书《情采》：“老子疾伪，故称‘美言不信’”。《义疏》先释词：“老子，春秋末叶哲学家。疾，痛恨。信，真实。”后析义：“老子厌恶虚伪，所以他在其《道德经》里指出：‘美言不信’。而他心目中的‘美言’，无异孔子指斥的‘巧言’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荀卿所谓“口行相反”（《荀子·致士》），今人说的“花言巧语”，一点也不真实。假如象有的注：“《老子》，‘美言不信’”。征引原文了事，不通晓《老子》的读者，肯定会觉不通俗。甚至发生误解，以为老子反对语言的美丽。其实，他的《道德经》，语言纯粹，一向被称为哲学诗，而《情采》下文以《道德经》的语言“精妙，并非弃美”。本书《体性》：“习有雅郑。”《义疏》释雅郑：“旧题《毛诗序》：‘雅者，正也’。郑，本春秋国名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孔子批评郑国的音乐：‘郑声淫’。又《阳货》载孔子不满郑国的音乐‘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’。后世谈音乐，常常雅郑并提，本篇以雅郑比喻人们习惯的邪正。”要是象有的注：“雅正，犹言雅俗。”读者可能会觉不通俗的。再者，《义疏》为了通俗，还注意到时、空观念。本书《时序》：“暨皇齐驭宝”的“齐”，《义疏》指为南朝的齐代，使不与北朝的齐代相混。《通变》：“宋初讹而新”的“宋”，《义疏》指为南朝刘裕建立的宋代，省称刘宋，使不与赵匡胤建立的宋代，省称赵宋相混。言曹操，《义疏》指为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时期的魏武帝。说颜之推，《义疏》指为北齐人。这样时、空分明，不但通俗、清楚，而且有助于文义的理解。

二、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的、哲学的、阶级的观点为武器。《情采》集中论述内容决定形式。《义疏》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关于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观点，加以发挥，指出刘勰忽略形式从内容派生后反过来为内容服务的缺点。本书《辨骚》以战国南楚诗人屈原创造的《离骚》里的神话为“诡异之辞”，《诸子》里所涉及的寓言是“踳驳之论”，《夸饰》称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、扬雄的《甘泉赋》、东汉班固的《西都赋》、张衡的《西京赋》夸张汉天子宫殿、京都、苑林的品物，与“义睽刺”，《义疏》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关于艺术虚构的观点，指出这是刘勰不懂文学浪漫色彩的错误。本书强调“奇”与“正”、“刚”与“柔”、“典”与“华”、“奇”与“偶”、“繁”与“约”、“文”与“质”、“壮”与“轻”……的联系而不孤立，亦即相反相成，不能割裂，《义疏》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，给予叙述。本书《物色》：“情以物迁”。物，指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象。《时序》：“歌谣文理，与世推移”。世，时代。推移，犹迁，变化。人们的情感随着外物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《义疏》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论的观点，指出刘勰的这些话，包含唯物的成分。可是本书《明诗》：“人禀七情”。禀，天赋。人们有天赋的七种情感。《义疏》指出刘勰的认识论，另有唯心的成分。《情采》：“盖《风》《雅》之兴，志思畜愤，而吟咏情性，以讽其上。”兴，起，产生。上，指天子或君。《义疏》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，指出《诗经》的《风》《雅》的作者属于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。郑玄称《风》《雅》的诗篇有“正”“变”，而“变风”“变雅”发抒怨怒黑暗现实的情感（《诗谱序》）。那末，《情采》“蓄愤”的“风”“雅”，当为“变风”“变雅”，作者的愤慨，无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；而作者吟咏的目的，也有本质的差异。象《小雅·正月》为“变雅”，它的作者系开明的奴隶主贵族，他直指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”。谴责西周昏君幽王将以好色、荒

淫亡国。他的讽刺，是劝幽王悔悟，改良政事，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，好比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仆人焦大骂贾府，不是要打倒贾府，而是希望贾府好似的。西汉淮南王刘安在他的《离骚传》里写道：“《小雅》（指“变雅”）怨诽而不乱。”鲁迅《流氓的变迁》：“司马迁说‘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，乱之和犯，决不是叛……’”。都是这个意思。不可否认，“变雅”这类诗篇，毕竟暴露了周王朝的一些罪恶，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。至于“变风”的作者，都是奴隶，他们对现状不满，觉得痛苦，就控诉，要反抗。如《魏风·伐檀》的作者警告奴隶主“不素餐兮”，不再吃白饭，当寄生虫。而“变风”的《硕鼠》的作者向奴隶主贵族宣布，他要与“重敛蚕食于民，不脩其政，贪而畏人”（《序》）的魏君决裂，去到“喜悦，无忧苦”（郑玄笺）的“乐土”“乐国”。由此可知，“变雅”作者的愤慨讽刺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剥削、压迫，“变风”作者的愤慨、讽刺，截然不同。本书《原道》主张作文要原本“玄圣”“素王”的被称为“神理”的“道”，这是为什么？《义疏》肯定这种“道”就是战国孟轲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或劳心，或劳力；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；天下之通义也”的“通义”，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着眼，乃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原则，所以被一切统治阶级誉为“放之四海而皆准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一成不变的“绝对理念”、“永恒正义”。荀卿论政，既曰“法先王”，又云“法后王”，表面似乎矛盾，实谓法后王之法，法先王之道；道不变化，“文武之道同伏戏”（《荀子·成相》）。而“天下无二道”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，道为百王所同，后王同乎先王，人君“生乎今之世，而志乎古之道”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。臣民也得“生乎今而志乎古（之道）”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。基于阶级利益，道得为各种言行的主导。文学有为政事服务的一面，刘勰是封建阶级的文学批评家，他当然会以上述的“道”为“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”（本书《宗

经》)。他作本书，会“本乎道”。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篇，会为《原道》。

三、理论结合实际。文论从创作实际总结出来。以中国古代卓越的文论家而言，作《典论·论文》的曹魏文帝、著《文赋》的西晋陆机、撰《诗品》的萧梁锺嵘与本书作者刘勰等都是不平凡的作者。李唐姚思廉《梁书·刘勰传》称“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，必请勰制文”。而勰的“文集行于世”。本书辞采的简括、形象、优美，可当文学作品读。而刘勰论文，大都有所为，我们研究本书，不能脱离文坛实际。故每篇《义疏》的第一条，多为解题，阐明本篇所以写作的时代背景。《情采》的《义疏》第一条：“两汉以来，特别是刘勰所处的南朝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统治者腐朽异常，文学相应地颓废，文坛形式主义猖獗，诗赋的辞章，趋于‘淫侈’。本篇反对‘淫侈’，强调‘文质附乎情性’，正是缘事而发。”至若正文的《义疏》，一者结合作家、作品。事实证明，刘勰作本书，为的是品题先秦、两汉、魏、晋、南朝（止于南齐末）的文学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。他作本书以前，对过去和当世的作家、作品，都有所探索，用来论文，则言不虚设，他评论作家、作品，都“持之有故”，每每要言不烦，“以少总多，情貌无遗”。本书《才略》评论曹魏嵇康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“嵇康师心以遣论”。《义疏》先释词，后解义。战国庄周《庄子·齐物论》指责辨士的自以为是：“夫随其成心而师之。”师心，以心为师，师，名词用为意动词。是说嵇康立论，能独立自主，思想通脱，畅所欲言，不剿说苟同。鲁迅谓嵇康的论文，比阮籍更好，思想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。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这可移作“师心遣论”的注脚。《义疏》就此止步，仍嫌抽象，紧接到《嵇康集》里找证据。西周武王死，成王继位，年幼，周公摄政，管叔、蔡叔怀疑周公篡位，于是挟持武庚作乱。周公奉成王的命令，诛武庚，杀管叔，放蔡叔，世人以为管、蔡作恶，嵇

康否认这种说法，他作《管蔡论》以为管、蔡是周朝的忠臣，否则，周文王不会信任，他俩不识周公摄政是一时权宜之计，因而怀着忠周的心，反叛周公，不是作恶。《嵇康集》里的《难〈自然好学论〉》、《声无哀乐论》等，也都是反对旧说的论文。综观嵇康的这类论文在其作品中占上风，所以刘勰特为提及，可不意味嵇康思想通脱的文章，只限于论文，而《嵇康集》里有“非汤、武而薄周、孔”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不过数量不及论文罢了。而《嵇康集》里的诗也不差，本书《明诗》称其“清峻”，然而视其论文逊色，故存而不论。论作家，举其文章的最优秀者，不在一处一一叙列，这是刘勰论文的特点。

二者结合文学史。本书的许多篇章，都与文学史有关。《时序》是上古、中古的文学史，《明诗》是上古、中古的诗史，《诠赋》是先秦、两汉、魏、晋的赋史，《乐府》是上古、中古的乐府史，有通史，也有专史，《义疏》都紧密结合了文学史。《明诗》：“宋初文咏，体有因、革，庄、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”《义疏》结合文学史，指出西晋怀帝永嘉以来，社会空前险危，曹魏齐王正始融合老、庄的玄学进一步渗透文坛，东晋偏安江左，而“玄风独扇”（萧梁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）。刘宋初年，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加剧，不少被排挤的官僚文人，矢志不平，无力反抗，只好暂时隐避山林，发言为诗，则偏于山水的刻画，诗的主要内容，易“玄气”为山水，谢灵运的诗可为代表，这就是诗这一文体的“革”；然而诗的形式，更加追逐汉来的“淫侈”诡巧，“偏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”（《明诗》），这就是“因”。《情采》批评“后之作者”“为文造情”，“志深轩冤，而泛咏皋壤；心缠机务，而虚述人外”，显然有的放矢。《义疏》结合文学史，指出这是隐射晋、宋诗、赋家的虚伪。在他们的作品里，“真宰弗存，言与志反。”不存在真情实感。晋宋玄学风行，连奢侈的御用文人也清谈老、庄，伪装恬淡，波及文坛，诚如

刘勰所云。西晋的石崇，常要客宴集，令美人行酒，强使客饮，客饮不尽，就杀美人，沉湎酒食，一至于此（刘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汰侈》）。又崇在荆州刺史任内，劫夺杀人，以致巨富”（萧梁刘孝标注引东晋王隐《晋书》），供其挥霍，生活糜烂到如此地步；他与“趋世利”的潘岳谄事权臣贾谧，每候其出，望尘而拜；但他因仕途坎坷，作《思归引》，扬言“少有大志，夸迈流俗，晚节更乐放逸，笃好林藪，傲然有凌云之操。”潘岳和石崇一样，他作《闲居赋》，以老、庄自饰，声称“览止足之分，庶浮云之志。”又作《秋兴赋》，表示要“逍遥乎山、川之际，放旷乎人间之世。”谢灵运性豪奢，仕宋，自谓才能出众，宜参权要，被贬为永嘉太守，意不自适，就大修别墅，放浪山水，不忘腾达。可是他写山水诗赋，则援佛、老，标榜清高。或曰：“心放俗外，投吾心于高人。”（《山居赋》）或曰：“昔余游京华，未尝废邱壑，”清顾炎武斥其“以文章欺人”（《日知录》）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而这些作者，都在笔下显示其虚伪性，真是言不由衷，“为文造情”。

三者结合创作经验。本书的某些论点，从前人和它的作者的创作经验得来。《神思》：“意翻空而易奇，言征实而难巧。”《练字》：“故善为文者，富于万篇，贫于一字。”《附会》：“改章难于造篇，易字难于代句。”……都是作者的甘苦之言，经验之谈，没有创作实践的读者，便很难亲切地了解。《义疏》一一参证，使从抽象到具体。

四、辨正原文及其旧说的讹误。注释古籍宜“钩深至远”，“辨是与非”。不能作纯客观的叙述。德国作家歌德在《莎士比亚以及没有他的止境》这篇文章中说：“卓绝的大师所写的一切，并非都是卓绝的。”这是古今中外学者所共同遵循的科条。真正的学者不相信“曾经圣人手，议论安敢到”的讹言。奴性十足，脑子给他人跑马的人不能发展学术。在崇儒、尊经的东汉，王充以

“疾虚妄”(《论衡·自纪》)自任,悍然“问孔”“刺孟”,非誉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里的若干章句;李唐刘知几《史通》的《疑古》《惑经》,继承、发扬了这种科学态度。凡是精读本书的读者,便知道刘勰也有这种精神。他“品列成文”,有的“同乎旧谈”,有的“异乎前论”,不“雷同”“苟异”(本书《序志》),不是强有力的证明吗?他从思想上认识“虑动难圆”,谁都“鲜无瑕病”(本书《指瑕》),我们肯定他为南朝卓绝的文论家,不妨碍辨正本书若干讹误。这在上文讲了一些,现在,我们还可补充两点:《知音》以秦始皇囚系、毒死法家韩非,西汉武帝不重用赋家司马相如,是“贵古贱今。”《义疏》辨正此说,以为秦自孝公用法家商鞅变法,法术思想一直被秦王朝采纳。始皇原先倾心韩非,是政治思想投合的表现。韩非虽然是儒学大师荀卿的学生,政治思想却集申、商法、术之大成,为同门、法家、秦丞相李斯所赏识,而李斯的学养不及韩非。李斯辅佐始皇推行法治,沿用韩非学说。《论衡·书案》:“韩非著书,李斯采以言事。”殊不知韩非被始皇招引到秦国,李斯实以权势嫉妒他,与姚贾诽谤他,始皇给谗言迷惑,终于囚系、毒死他,哪是“贵古贱今”呢?司马相如尽管是赋家,却有济世志,倘用鲁迅的话说,本想为武帝“帮忙”,临终还作《封禅文》劝谕武帝,企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,而武帝以为“言语侍从之臣”(班固《两都赋序》),若倡优畜之,要他“帮闲”,不踞要津,又哪是“贵古贱今”呢?《事类》:“文章由学,能在天资”,“才为盟主,学为辅佐,主佐合德,文采必霸”。才与天资为同义词,是天赋。刘勰为其唯心的天才论所囿,哪怕“才”“学”并举,到底分清主、佐,而以“才”为主,是创作成、败的决定因素,而他论文,也就把作者的“才”放在第一位,《义疏》辨正此说,以为人的天赋,或素质,是人生来就有的一定的生理和解剖的特征。应该肯定,天赋或素质在人的能力发展中起着作用,它是人的能力的自然因素,而人的能力的发展的决

定因素确是后天的学养。刘勰唯心的天才论，散见本书，《义疏》随时辨正。至于论品本书的旧说，长短互出，《义疏》严予鉴定，长者服从，短者辨正。郑玄与西汉毛萼治经，同属古文学派。而玄“注《诗》，宗毛为主，毛义若隐略，则更表明；如有不同，即下己意，使可识别也。”（《六艺论》）郑《笺》对毛《传》，因沿、引伸、补遗，提高毛《传》，而玄不愧为毛公的诤友、功臣。《义疏》始终师范郑《笺》，商榷古今校注。《辨骚》：“酌奇而不失其真。”唐写本以本书时或奇、正相对为文，改真为贞，贞之为言正也，以便奇与正相对，实不烦改字，因为真亦可训正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令德唱高言，识曲听其真。”李善注：“真，犹正也。”《通变》：“是以九代咏歌，志合文则。”元本则作财，亦不烦改字。今本作则，文从字顺。东晋郭璞《尔雅图赞》：“永观厥祭，时维文则。”文则本为陈言，《通变》因之，则犹下文“文律”，此词初见于西晋陆机的《文赋》，是说修辞的基本规律。《史传》：“荀况称‘录远略近’。”考《荀子·非相》：“传者，久则论略，近则论详。”刘勰曰：“录远略近。”与荀义不悖。《史通·烦省》因以为言：“昔荀卿有云‘录远略近’。”前人征引旧辞，或括其义，而不拘原文。录远句如之。清浦起龙著《史通通释》，以刘勰误引荀文，改曰：“远略近详。”不识“略”字后省略介词“于”，有“比”的意思，谓作史记，记录远代之事，要比近代的简略，下文称俗人“爱奇”，作史记“录远而欲详其迹”，与此乖忤，故知几从而非之。今人的校注，值得商榷的，《义疏》也不忽视。《夸饰》：“至《东都》之比目，《西京》之海苦。”有人注：“此云《东都》，盖误记也”未谛。顾炎武说：“古人为赋，多假设之辞，叙述往事，以为点缀，不必一一符同也。”其他文体，也或这样，文学语言，不限于真人真事。六朝人好作骈语，喜调声律，放言遣词，假设是常有的事。沈约《锺山诗应西王教》：“南瞻储胥观，西望昆明池。”李善注：“储胥观、昆明池，皆在西京，此皆假言